

中 国 当 代

教 育 学 家 文 库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分会 / 组编

调适与转型： 传统教育变革的 重构与想象

| 田正平◎著 |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调适与转型：传统教育变革的 重构与想象

田正平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

本书封四贴有含人民教育出版社注册商标  的标识，
无此标识者视为盗版图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调适与转型:传统教育变革的重构与想象/田正平著.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12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ISBN 978 - 7 - 107 - 31324 - 0

I. ①调… II. ①田… III. ①教育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2217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张: 47 插页: 1

字数: 779 千字 印数: 0 001 ~ 1 500 册

定价: 113.9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电话:010-58759215 电子邮箱: yzzljk@pep.com.cn

《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育理论界不少学者在理论研究与学术实践中进行了艰辛的思考与探索。他们学风正派，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精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们的精辟见解大都集中反映在凝聚着他们心血的一部部鸿篇巨制和大量学术论文之中。

系统、科学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于廓清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精华、揭示规律，为今后的教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组织编选了20卷本中国当代教育学家自选集《中国当代教育论丛》（简称《论丛》），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论丛》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列为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在新中国成立65周年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成立35周年之际，我们决定组织编选新时期教育学家自选集，定名为《中国当代教育学家文库》（简称《文库》）。《文库》是《论丛》的继续，与《论丛》相得益彰、互为补充。《论丛》已收录的，《文库》不再收录。

这套《文库》各卷的作者大多数是中国当代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研究领域的专家。在长期的教育科学研究中，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术思想开放，工于学理分析，努力揭示教育的客观规律，促进教育学的科学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始终关注着现实的重大教育问题，或系统阐述，或直书议论，或发表评论，或提出商榷，撰写了一批对我国教育理论建设及教育改革与发展有

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及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荟萃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精华，折射出我国新时期教育学家对教育科学和教育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奉献。有的论文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术观点，我们相信，实践会做出检验，时间会做出评判，读者会做出思辨。

这套《文库》主要采取论文选辑的形式，每人一卷；收入的选文精选自著者发表过的有关论文，分别标明出处，必要时加题解说明；各卷的选文主题相对集中；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对每卷篇幅有所限制，对有些内容不得不忍痛割爱，这是需要向作者和读者特别说明的。

这套《文库》的编选、出版，是我们系统总结新中国教育理论学术成果的重要举措。教育学术界学者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给予了热情关注，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各卷作者付出了辛勤劳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贯以教育事业为重，以学术为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资助。对此，我们深表谢意！限于水平，这套《文库》的编选、出版工作可能存在不妥和不足，敬请读者不吝指教为感。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2014年10月

自序：我与中国教育史研究

我出生在山西省应县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家中四个孩子靠父亲一人的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我记得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父亲每月工资是 18 元，这点收入要维持生活在城镇的六口之家的生活，还是非常拮据的。因此，我们四个孩子中，长我 6 岁的姐姐，小学毕业后尽管考上了初中，但由于经济原因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参加了工作，每月从微薄的收入中寄 5 元钱给家里补贴生活。妹妹和弟弟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别读完初中和高小而辍学的。1963 年当我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有机会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大学生。

一、与中国教育史的“偶然相遇”

1963 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第二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则是试行“高教六十条”，对 1958 年以后“教育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力图进行清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弦”却绷得越来越紧，在 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反修、防修”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在这种背景下进入大学校门的我们，五年半的时间里参加了两次农村的“四清运动”和一次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 1966 年开始，又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可以说，我们的大学教育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度过的。

中国教育史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课程体系中是安排在第三学年才开设的，所以，在学校读了五年半书我们这届“红卫兵大学生”，没有上过一天教育史课。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我有机会接触了这个领域。我曾在一篇口述史中回忆过这段“偶然相遇”：

大概是1967年的七八月份吧，听说“中央文革小组”给师大布置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要师大在几个月内编写出中、外教育制度史两种书供有关领导参考。……我被作为学生代表吸收参加了中国教育制度史的编写。……我们先是集中一段时间看书，又从教育系资料室借了很多讲义、资料阅读，还开过为数不多的几次会议，拟定了一份提纲。我估计当时是按照大家的知识结构分配任务的，每人负责一章。我是学生，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教育史，不管古代、近代、现代还是当代，对我而言，都是一张白纸。于是分配我写中国当代教育制度，这是最后一章，但应该是最出彩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章要全面阐述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系统思想和实践啊！其他各章都应该是以批判为主，我这一章要看到光明。好在当时毛主席这方面的论述收集起来十分方便，还有社会上流传的大量过去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谈话、讲话、信件等，最后写了近两万字，算是交了卷。在师大读书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我还从未正儿八经地写过东西，只是完成过几篇作业，这一回真下了点功夫，自己对写出来的东西还较满意。……书稿写成后，还修改过几次，定稿后的篇幅是十几万字。书真正印出来时，我已经离开学校了。我是1968年十二月份离开学校的，书大概在1969年六七月份才出来。还寄给我两册，一册是《中国教育制度史》，另一册是《外国教育制度史》。收到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比较熟练的泥水工了，那时候连大学的教科书都卖光了，准备当一辈子工人，谁还要这玩意儿？翻了翻就随手扔在一边，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本收录了我的处女作、留下“文化大革命”深刻烙印的《中国教育制度史》。但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值得纪念的一件事，这件事让我接触了中国教育史，还搞了近半年的“研究工作”。我以后从事中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歪打正着，这应该算是一个起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这件事引发了我对教育史的研究兴趣。^①

口述史的访谈活动是2010年5月，在我应邀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博士生论文答辩时由于述胜教授安排的，此前我还真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对教育史学科的兴趣是缘何而来的。现在进一步思考，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可能

^① 于述胜等著：《中国教育口述史》第一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

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虽然我们入学后的头两年也断断续续地开设过一些课程，如教育学、心理学等等，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讲授这些敏感课程的老师受到多方面的制约，难以真正做到心口一致、敞开思想；而这些课程的教材又多是临时拼凑而成，所以对我个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有机会接触一些教育史的资料和文献，而且是带着一定的写作任务去读书看资料想问题，所以印象反而较深。特别是接触了一些原始文献之后，让我对中国教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历史有了一点朦胧的认识，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门课程还能提供一些具体的知识，与那些空洞说教的课程相比，无形之中让我对中国教育史产生了“好感”。这种朦胧的认识和模糊的感觉，在十年之后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二、泥水工、中学教师、报考研究生

古人讲“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说来惭愧，我真正接触中国教育史，进入专业学习是34岁以后的事情，早已过了而立之年。1968年12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至冶金部在山西的一个大型企业，这个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为冶金系统的矿山和工厂修建厂房、住宅。那一年一起被分配到这个企业的大学生据说有三百多人。我的工种是泥水工，就是盖房子砌砖的工人，每天与工人们一起早出晚归，白天一身泥土，傍晚下工后在小河边洗洗干净，也就没事了，身体上受些累，精神上倒也轻松。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我们的工地离当地的县城有一段距离，大家难得在星期日上城里一次。大概是1971年前后吧，我利用星期日去了一次县城里的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有一套中华书局版的《史记》，标价好像是十几元，这在20世纪70年代已是我们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几经踌躇，来回跑了几次县城之后，最后下决心买下。此后，每天收工之后，有空儿就随意翻几页，现在回想起来，这种不经意间的阅读，既是对大学期间萌发的对中国教育史产生的“好感”的一种延续，也有助于将这种“好感”培养成兴趣。

转眼到了1972年，我们的工人生涯也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有消息说，企业要把原来的职工子弟小学扩充为中学，正在寻找合适的教师。说实话，虽然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但在那个“文化大革命”远未结束、“知识无用论”仍然盛行的年头，是宁肯当工人也不愿意到学校去工作的。不久，组

织上就找我们这些北京师大、华东师大的毕业生谈话了。对于正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我们这批“老九”而言，没有什么理由好讲的，服从分配吧。大概是这一年的四月份，我们十几个师大毕业生，先后都到子弟学校报到。我被分配当班主任兼五个初一年级班的政治课教师，每周10节课。以后，我们就随着学生一块升级，初二、高一、高二……（那个时候初中、高中均是两年制），后来，企业成立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我又去当工人大学的老师。到学校工作后，很快感觉到我们这批人还是非常容易适应学校生活的，毕竟已经在学校呆过十六七年了；最大的好处是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可以看一些自己愿意阅读的图书。这一时期全国上下正在大搞“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为了给学生上课或参加学校组织的批判会，我阅读了当时配合运动出版的《论语》、《孟子》、《论衡》、《盐铁论》、《韩非子》、《曹操集》、《柳宗元集》、《读通鉴论》等著作的部分章节，有的是为了摘录批判的“靶子”，有的则是为了寻找批判的“武器”，现在看来，尽管当时的阅读“动机”并不高尚，但客观效果却是让我增长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教育的知识。

大约是1977年年底或1978年年初吧，恢复高等学校研究生招生的消息在我工作的山沟里传开了，大家兴奋异常。我曾在一篇发言中对当时的情况有所回忆：

我们这批早已过了读书年龄而基础又很薄弱的“准中年人”（当时更多的是一批名符其实的中年人，早已过了40岁），当时的兴奋之情真是难以形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1978年5月，我是在当时工作的山西省垣曲县一所中学的教室里参加全国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的。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正式考试前，大家在教室里聊天、互相介绍各自的情况。有好几位考生非常自豪且充满自信地说，自己是正儿八经的“文革”前的中学生，整整上了9年学；“文革”前高中毕业的考生就更不要说了，整整读了12年书，坐在那里，气定神闲……对当时许多考生来说，研究生是个什么概念，它有哪些基本要求，完全不知道。只晓得，考研究生是个可以继续读书的机会，是个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大家是抱着这样的梦想与目的参加考试的。我自己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大学毕业后的第十个年头，再走进大学校门的。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对于我和与我有相同命运的许多人而言，1978年是个重要的命运转折点，所以，过去30多年了，回想起来，仍然对那个年代满怀敬意与感

激之情。^①

研究生是按专业招生的，所以报考研究生必须选择学校、确定专业。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回母校读书，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不知道北师大教育系哪些专业招生，于是就给顾明远老师去了封信打听消息。我在师大读书时顾老师并没给我们上过课，他肯定不认识我，恐怕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因顾老师是当年系里最年轻的副系主任，所以学生们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没想到我抱着侥幸心理寄出信后不久，就收到了顾老师热情洋溢的回信，鼓励我回母校读研究生，并告诉我各个专业都准备招生。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点奇怪，当时我连想都没想就决定报考中国教育史专业，而中国教育史这门课我们在校期间就根本没有开设过。这大概就是十年前参加编写《中国教育制度史》播下的种子潜滋暗长的结果吧。决定了专业之后，我立刻给北师大教育系的王策三老师去信求救，因为这门课没有开设过，所以手头根本没有教材。王策三老师本来就给我们上过教育学课，再加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我们班级的“复课闹革命”，和同学们十分熟悉，所以，我的信寄出不久，就收到王老师挂号寄来的两厚册蓝色封面油印的北师大自编的中国教育史讲义，讲义中还夹着王老师一封信，鼓励我要抓住机遇认真复习，还需要什么资料尽管写信。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就是自己的努力和运气。当时，我是我们那所从小学到“七二一”大学的一揽子学校的教务负责人，白天工作忙得根本没有时间看书，晚上六点钟放学后才是我个人的时间。常常是放学后先看两个小时的书回去吃晚饭，然后再回到办公室看书，直到后半夜两三点钟再回家睡觉，第二天照常上班，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个多月。有一天下午收发室交给我一封信，拆开一看是顾明远老师写来的。他告诉我说，最近系里开会，教育史两位老先生（毛礼锐、陈景磐先生）提出今年（1978年）不招生了，因为来不及准备，明年再招。顾老师告诉我，系里其他专业仍按原计划招生，还是鼓励我回母校攻读学位。我一方面非常感谢顾老师及时地把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告诉我；另一方面，这个消息也真让我大吃一惊，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选读别的专业——在思想深处起作用的仍然是参加编写《中国教育制度史》的那段经历——只是觉得无法回母校是一大遗憾，而更

^① 田正平：《感恩·感谢·感想》，在“规训与书写：开放的教育史学——纪念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25周年”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杭州，2013年。

紧迫的是，全国高校中哪个学校当年招收中国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我一无所知。第二天，请了假去县教育局查阅全国招生目录，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学校和一位招生导师，即杭州大学教育系的陈学恂教授。在当年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的环境中，我对杭州大学和陈学恂教授的名字完全陌生；但是，要读中国教育史专业，就只有这一条路，我毫不迟疑地在报考表格上写下：“专业：杭州大学教育系中国教育史；指导教师：陈学恂教授”。

三、跟随陈学恂先生读研究生

1978年10月，在离开大学校门整整十年之后，我才开始接受比较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此时已是34岁。关于三年的研究生生活，我在《感恩·感谢·感想》那篇发言中有过这样的回忆：

从1978年10月至1981年10月的三年研究生生活，可以说与老师朝夕相处。包括以后留在系里基本上也是天天有所接触。陈先生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无法在这里全面展开，我想讲三件小事，谈谈我的感受。第一件事是“我的被录取，有机会继续读书”。我们第一届研究生招生时，全国所有高校中，只有原杭州大学教育系招收中国教育史硕士生。因为是停了十年之后全国第一次招研究生，这个专业又是只有一位导师，所以，这年报考陈先生的人特别多，据说有七八十位。一个月后接到复试通知书，让我来杭州复试。到学校一看，参加复试的有四名考生，但最终只有两个名额。四人中，我是1968年毕业的，另有两位分别于1962年和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他们分别完整地读过这两所著名师大的教育系课程，第三位是一位在职的大学教育系教师，在大学里讲授教育学课程。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我心都凉了，肯定没戏了，就我是个“野路子”。尽管初试的成绩是第一名，但完全没有了信心，已经做好了来年第二次再考的思想准备。然而，在复试之后的一个月，我却收到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的兴奋、激动就不用说了。到学校报到后一段时间，和周围的老师熟悉了，有几位悄悄告诉我，说你真沉得住气，和你一起复试的几位同学，都去看过陈先生，考试前就不要说了，为了避嫌；你怎么考试后也不懂得去老师那边走动走动！这几句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以后多年的接触中，陈先生从未

谈及此事，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为人的正派、正直，却时时在感染着我，熏陶着我，影响着我此后的为人处事方式，甚至包括我以后有条件招生了，影响了我对考生的态度。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老师为学生借房子”。大约是1982年六七月份，我刚留校不久。当时，我爱人仍在我们原来工作的学校当教师，她本来体格就弱，加上孩子小，教学任务重，又是一个人带孩子，结果就累得生病住院了，但是，怕影响我学习，一直没有告诉我。住院半个多月了，每天靠同事们送饭、照顾，医院条件差，病不见好，长此也不是个办法，他们学校领导就通知了我。我得到消息后很急，向陈先生说明情况，陈先生马上让我回去照顾，并一再嘱咐我，如果仍不见好，想办法转到南方来吧，不要耽误了。这样我就赶快回到山西，在当地医院又继续治疗了半个月，仍不见好，医院主动建议，是否将病人转到大点的医院看看。这样就连大人带孩子一起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病情明显好转。与原单位联系，原单位领导很照顾，说让她继续休养一段时间吧。这样，我们就准备从上海到杭州来。当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陈先生后，立刻就后悔了。问题明摆着，我当时是一名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几个单身教师住一间房子，在学校住房那么紧张的情况下，她们来了怎么住？当时又没有租房子一说，两位数的工资收入更谈不上住宾馆。这不是给老师出难题吗？正在我后悔不已的时候，收到了陈先生的信，告诉我让家属和孩子来杭州吧，这里已安排好。当我们从上海回到杭州时，果然有了一间从学校临时借来的学生宿舍，房子就在当时的第6幢女生楼，在陈先生的关照下，教研室的邵祖德、张彬两位老师，早已把一间旧学生宿舍打扫得窗明几净，一进屋就让我们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在这间宿舍住了大约半年，病情稳定后我爱人才回山西原单位。半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给我们，包括我们的孩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深深地体会到，在陈先生对学生严格要求、不苟言笑的背后，更有着对学生的深沉的关怀和爱护。这方面也深深地教育了我，鞭策着我，但是，我却远远没有做到。第三件事，是“陈先生的诲人不倦”。这里借用《论语》里的一句现成话，主要指的是陈先生那种甘为人梯，在学术上特别乐于助人的精神。这不是体现在哪一件具体的事情上，而是跟随陈先生多年的一种强烈感受。我来读书的时候，陈先生已是67岁高龄了，还担任着教育学系系主任一职。我记得，读研究生那几年，不用说，几乎是天天都要去

一次陈先生处的，即使毕业留校工作后，大概至少每周也得去一次，如果哪一周不去一次，似乎感到生活中缺了点什么。每次见面，总是看到陈先生不是在看书或与系里其他老师商量工作，就是爬高爬低，在书架上寻找资料。要不然，就是递给我一张纸条，让我去图书馆查某份杂志或借某本书。在当时，最让我不可理解的是，陈先生把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为那些在我看来素不相识，或是关系很一般的人身上。往往是这些人在研究或教学时碰到什么问题，来信向他请教，陈先生就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他们找资料，查书籍，写回信。大家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几种大型教育史资料书尚未出版，资讯更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即使想找一则现在看来很普通的史料，当时也很费力，如果没有人指点，将要付出极大精力；反之，如果得到专家的指点则将节省许多时间和力气。有时为了帮助外地求教的师生查找资料，陈先生也常常让我帮他去找，次数多了，我在私下不免发些牢骚，甚至当面也表现出不高兴。陈先生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看到的样子，照样让我做些类似的事情。直到多年后我才理解了陈先生的良苦用心：一是通过查找这些一件件要求不同、内容各异资料，培养和训练我对史料的感悟力和查找、鉴别史料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借助此类事情为我和学术界建立某种“人脉”。因为他在给那些向他请教的各地学者回信解答问题时，总不忘附上一笔，这则史料是请某某同志帮助查找的，无形之中为我与这些学术界的前辈、同辈建立了联系。记得在协助陈学恂先生和陈元晖先生一起编辑10卷本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的时候，陈学恂先生让我去北京向陈元晖先生汇报有关工作。陈元晖先生既是老革命，又是学术大家，我从未见过面。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推开陈元晖先生的家门，我还未开口，陈元晖先生即迎了上来，大声说：“你就是田正平同志，学恂教授多次谈起你。欢迎，欢迎！”两句话就把我的不安、局促打消了。类似的情况还非常之多。我常常想，平心而论，陈学恂先生一生并未如有些专家学者那样，著作等身，甚至1949年以后公开发表的论文都屈指可数。但是，为什么他在学术界享有那么高的声望、那么好的人缘？几十年时间过去了还惠及我们这些后辈？无论是他的前辈学者如孟宪承先生、庄泽宣先生，还是他的同辈学者如陈元晖先生、刘佛年先生、潘懋元先生，晚一辈的孙培青先生、江铭先生、李桂林先生、王炳照先生，等等，大家谈起陈先生都是众口一词，那是位好人，是一位真正的

学者，表现出由衷的钦佩之情。我想，其中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陈先生那种“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的襟怀，那种甘为人梯，不求闻达，乐于为更多的人铺路搭桥的精神，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可能永远也达不到陈先生那种境界，但是，正如古人讲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陈先生这方面的言行让我多少年来不敢懈怠。这是我讲的印象很深的第三件事。^①

当然，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以及后来的近十年相处，陈先生对我的影响、教诲是多方面的，我上面讲的几件事，也是在那次研讨会上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感而发，远远不够全面。三十几年过去了，陈先生去世也已近四分之一世纪，可以说“墓木已拱矣”。2011年秋，陈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我们几个学生搞了个活动，去为陈先生扫墓，寄托我们的思念。站在这位老人的墓前，我回忆了自己这三十多年来走过的路，心头充满了感激之情，也交织着愧疚之意。是陈先生把我引上了从事学术研究之路，使我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可以说影响了我此后的一生，这让我永怀感恩之情；同时，又为自己在许多地方背离陈先生的教诲而愧疚不已，鞭策自己：“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四、个人学术经历

从1981年10月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已经35个年头，从个人学术经历的角度看，这35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年至1990年的大约十年，第二阶段是1991年至2001年前后的十年，第三阶段是2001年迄今的十余年。

第一个十年是跟着陈先生打史料基础，接受训练，先后参与了近一千五百万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史料与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我们知道，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课程或学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大致分为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两个部分。早在196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由孟宪承、陈学恂等先生编辑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越一年，

^① 田正平：《感恩·感谢·感想》，在“规训与书写：开放的教育史学——纪念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25周年”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杭州，2013年。

由孟宪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亦告编成。这两种学术价值很高、以原始资料为主的教学辅助教材，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与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深厚积累相比较，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基础性工作做的较少，而传统教育近百年来来的变革又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下进行的，因此，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字、各种载体的文献、资料散处国内外，真是浩如烟海。如果不对这些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初步的收集、整理、出版，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就难以有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学科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的杭州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在陈学恂先生的带领下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其实，在跟随陈先生读研究生不久，我就听到教育史学术界流行的一种说法，大致意思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所大学的教育史专业，均以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见长，而杭州大学的中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则是以中国近代教育史见长，尤其反映在资料、文献的积累方面。这种说法也从一个侧面得到印证，在我读研究生期间，东北师大的李桂林教授、福建师大的陈本铭教授都和我说过，他们都曾经专程到杭州大学跟着陈学恂先生进修中国近代教育史，李先生说，他在杭州大学呆了整整一年。

我们入学后不久，就参加了陈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的编纂工作，以后是《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和《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中、下）的编辑工作。其实还在我们入学之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就委托陈先生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教材，陈先生答应下来，但是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认为，在正式着手编写《中国近代教育史》教材之前，最好取法古代学者编纂历史著作的传统做法，先做纪事本末（大事记）、资料长编（教学参考资料）等一些基础性工作，然后再动手，才有可能写出一部较好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同意了陈先生的建议，放手让陈先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上面三种资料出版之后，我又协助陈先生完成了《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下）的编辑工作。按照陈先生的设想，上述工作结束后本来可以转入《中国近代教育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了。但是，教材的编写未能按计划实行。原因是，前述几种资料书出版后，学术界和社会上反映都很好，当时各出版社纷纷约请陈先生主持一些更大规模的有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资料性书籍的编纂工作。据我了解，有一段时间陈先生也为此事颇为烦恼：说实话，编写一本资料丰富、观点平实，体现自己一生学术心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材是陈先生多年的宿愿，当时他已

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写一本教材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抓紧时间花个两三年工夫，这一宿愿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陈先生深知，当时已有的这些近代教育史的资料和文献，对于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而言是相当丰富了，但是，对于进一步开展更深入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就连他自己手头掌握的资料，也有许多未来得及整理。反复权衡之后，陈先生毅然接受了上海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约请，担任《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10卷）和《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24卷）的主编，把自己多年的宿愿放下，又带领我们为这两套大型资料书的编纂而日夜劳作。直至陈先生去世，他主持的两套大型资料书已陆续出版，而他魂牵梦萦的《中国近代教育史》却是在十年以后才得以面世。

陈先生主持的这些工作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建设上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不仅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我们这些在当时早已不年轻的学者补上了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最基础的一课。在上述近十年的史料编辑工作中，我大多是协助陈先生做些事情，有的是后来担任副主编，如24卷本的《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有的则是与陈先生合编，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也独立完成了两种资料书的编辑，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和《黄炎培教育论著选》。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这十年的熏陶和历练，让我接受了比较严格的史学训练，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围绕着资料建设，第一个十年间个人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发表在中华书局《文史》第30辑的《游学日本热潮与清末教育》和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二人合著，该书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但写作完成于80年代后期）。这两种著述由于有比较厚实的史料基础，所以发表和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前者获教育部首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美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任达，在其《新政革命与日本》（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称誉该文是一篇“卓越著作”。后者荣获教育部第二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二个十年，就我个人而言，重点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社会大变革所引发的中国学术研究转型，对中国教育史研究范式的思考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范式或曰解释框架，说得大点包括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解释框架，大致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以后就形成了一种

固定的取向，即所谓“革命史范式”。这种范式广泛地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各个领域，教育史研究当然也深受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教育方面打破封闭状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努力缩小与世界教育发达国家的差距：留学生们像潮水般涌出国门，大批外籍专家学者受聘来华，积极吸引国外教育资源，多项国际教育合作协定的签署，高等教育方面以美国为模式价值取向的彰显，等等。大学讲堂外的世界是如此五彩缤纷、生动鲜活，而我们在教室里还要按照六七十年代编写的教科书引导学生批判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生派遣是培养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才，谴责京师同文馆的聘请洋教习是“卖国主义”行为，轻蔑地把废除科举取士制度和“癸卯学制”的颁布等重大举措斥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后挣扎”，等等。“革命史范式”主导下的旧的分析框架完全丧失了对近代教育历史的解释力，在蓬蓬勃勃的现实面前更显得苍白无力。我深深地感觉到，这样的解释框架不改变恐怕是不行了，不要说服学生，就连我自己也难以说服。现实的刺激与启迪，是首要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我自己而言，是在陈先生带领下，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各种教育史料的收集、整理、出版，让我看到了过去所没有看到过的历史的另一面。在1949年后的30年间，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老一辈学者在研究工作中对史料的取舍受到种种限制，大量不利于“革命史”分析框架的史料文献被舍弃、被“过滤”，历史的另一面完全被“屏蔽”。现在，有机会接触这些过去没有见到的材料，为我们提出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这样一种训练所开阔的视野，使我对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有了底气。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著作被翻译介绍过来，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1985）、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1988）、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1989）等等，特别是后两种著作，对我启发很大。同样给予很多启示的还有一批中国学者撰写的著作，主要是国内历史学界、经济史学界关于“重评洋务运动”、“重评中体西用”的一些文章。正是上述三个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我们有机会在教育史学界率先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并努力付诸实践。

1989年6月，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体系的思考》一文，谈了长期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随着近年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新学习和大量新史料的发掘整理，我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一种被史学界